从人学价值到诗学价值

——论刘勰的人格理想与诗学追求之内在关联

杨来来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纵观《文心雕龙》全书，刘勰始终高扬人学价值与诗学价值，将自己的人格理想寄托于文之事业中，使其人格理想与诗学追求之间形成一种内在关联。顺着刘勰人格境界与诗学境界的“相通处”，有助于对其论文宗旨与文本性质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在对人学价值充分肯定的前提下，刘勰积极追求诗学价值的实现，试图从人文层面开拓文章巨大的文化意义空间。为此，《文心雕龙》始终着眼于“文的理想模式”的寻绎和理想人格的建构，目的是为了重建人文精神，这体现了其作为“中国文论元典”的超越性特质。

关键词：《文心雕龙》；人学价值；诗学价值；中国文论元典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1-0114-09

收稿日期：2024-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253）：《文心雕龙》汇释及百年“龙学”学案。

作者简介：杨来来（1994-），男，宁夏隆德人，聊城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1.012

迄今为止，关于《文心雕龙》（以下简称《文心》）一书的性质问题，学界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该问题的悬而未决，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角度地思考这个问题。例如，戚良德教授提出：“特别是从其作者刘勰的身世际遇、思想倾向以及《文心雕龙》的思想根源、创作动机的角度，重新认识这部书的性质，可能更有助于使我们接近其真相，从而更好地发掘其当代意义。”①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全面认识《文心》，首先需要深入地了解刘勰的文化心态，探究其论文的文化心理动因，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他的文学观念。这种研究思路与“文化诗学”所倡导的“‘主体——文化心理’模式”异曲同工。所谓“‘主体——文化心理’模式”，指的是“抓住文学艺术作品及其观念的主体，分析其文化心态，进而揭示文学艺术产生的文化心理动因及其所表征的主体之价值取向与人格理想”②的一种研究方法。中国文化诗学代表学者李春青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诗学存在一个“人格境界与诗学境界相通”③的鲜明特征，这是古代诗学观念生成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如果能够顺着“相通处”进行探索，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诗学理论生成的内在心理依据。

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主张通过研究对象的人格对其文学观念进行分析、描述和判断，主要缘于人格具有一些持久的稳定的特质，它关乎一个人的性格、品格，乃至其文章风格。在西方学术界，人格科学已经成为一门学科。④ 而在中国古代，也有“文如其人”的说法。对于《文心》的理论研究，其实也有相似的研究方向。如刘纲纪先生曾言：“具有强烈的人格精神，是刘勰《文心雕龙》一书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⑤李建中先生也谓：“《文心雕龙》是文论巨制，也是刘勰人格形象与人格境界的展示，读《文心雕龙》也就是读刘勰的人格。”⑥可以说，刘勰的人格深深地影响着《文心》的创构与传播，他不仅创作了《文心》，还将其人格理想

①戚良德：《文章千古事——儒学视野中的〈文心雕龙〉》，《文史哲》2014年第2期。

②参见李春青：《论文化诗学的基本特征与操作路径》，《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③参见李春青：《在人格与诗境相通处——论中国古代诗学的文化心理基础》，《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④“直到20世纪30年代，人格才开始被认为是心理学的特有部分，而这主要归功于奥尔波特（1937）的《人格：心理学的解释》和默瑞（1938）的《人格探究》等伟大著述的出版。在这个意义上讲，人格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科学，只有大约60年的历史。”（参见[美]珀文：《人格科学》，周榕等译，上海：华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⑤刘纲纪：《刘勰》，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66页。

⑥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

注入其中，塑造了这部书的文心与诗魂。基于此，笔者尝试借鉴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找寻刘勰人格理想与诗学追求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求对《文心》的宗旨和性质问题形成一些新的思考。

一、人学价值的肯定：从“性灵所钟”到“性灵所寄”

众所周知，刘勰的一生经历了“三个世界”，从“佛的世界”和“文的世界”进入“仕的世界”，最终又回归“佛的世界”。① 在这三重世界中，他经历了不同的身份转变，使其身上呈现出三种鲜明的色调：士人底色、学者特征和佛教徒身份，由此彰显出三种鲜明的人格特质。《梁书·刘勰传》中简单交待了刘勰的生平经历：

> 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②

于刘勰而言，任何一段经历，都是有益且影响深远的。进入佛门前的经历，使他养成了中国传统士人的两种优秀品质：一是笃志，二是好学。沉潜多年的佛门俗客经历，既对他论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使其人格趋于稳定，逐渐形成了知识渊博、思维缜密、论析严谨、识见高明等众多学者特征。更重要的是，佛教徒身份为他论文、著书、立功提供了极大便利的同时，更极大地提升了他的人生境界，凸显了其人格意义。“三重世界”的经历，使其身上既具备儒家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又有传统学者的博通和深邃，更有佛教徒的理性和智慧。

站在刘勰的立场来看，“三重世界”的经历不只是生存境遇的改变，也是“智”的完善与“心”的安放之旅，也能说明他有强烈的发展需求和充分的自为空间。每一次身份的转变，都代表了刘勰对人性本质的认知在不断趋于深刻。纵观《文心》全书，我们可以看到刘勰对自我及其人格理想有相当清楚的认知，这集中体现在《序志》篇中：

>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甚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③

细读此段引文，我们不难发现，刘勰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他将人置于“终极历史之圆”“社会历史之圆”与“个人政治性历史之圆”④三个同心圆中加以审视和阐释，从而确认了人的存在方式、根本价值与价值实现之方式。从“终极历史之圆”的层面来看，人终究是要死的，因而“形甚草木之脆”，只有凭借智慧才能出人头地，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从“社会历史之圆”的层面观之，人“超出万物”，乃天地造就的灵物，因而有其特殊的存在方式，需要通过获得社会认同来实现个人价值，以求“名逾金石之坚”；而从“个人政治性历史之圆”的层面而言，制作是获得价值长存的唯一方式，“树德建言”是“君子处世”的最佳选择。可见，刘勰是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待和审视人的存在方式及其意义实现这一问题的。这种由宏观到微观的论述方式是有其用心的，三个同心圆之间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重叠，共同作用下构成了刘勰对人性的完整认识。我们看到刘勰解释完书名含义之后，并没有直接从“文”进入去谈自己的创作动机，而是选择从“人”入手来言自己的论文初心。由此可以说明，对于人学价值的体认与肯定，为刘勰认识自我与世界、社会及文章的关系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从而形成了他对“个人的自我价值”的完整认知，最终促使他走上了“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序志》)的道路。

---

①参见李建中：《刘勰的人格境界与〈文心雕龙〉的人格理论》，《学术月刊》1997年第4期。

②[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10页。

③本文所引《文心雕龙》原文均据戚良德：《文心雕龙校注通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以下所引《文心》原文仅标明篇名，不再一一出注。

④这里参考了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提出的“三个同心圆阐释模式”。参见[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3-89页。

所谓“人学价值”，即主体对自我人格有充分的理性认知和有效的价值定位。只有在此意义上，主体才有人格意志，从而构成了实现价值的可能。正因为对自我价值有充分自觉的体认，刘勰对人性形成了独特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了他的人生价值观念和人生价值体系。于是在《原道》篇中，刘勰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人性主张：

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在此篇中，刘勰按照“天文—人文”的思路揭示和规定了文章的本质特征，其中明显涉及到其对人性的基本认知。在他看来，人与天地同源，是全宇宙生命体中的自觉者和最贵者，拥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即其所谓“有心之器”。但这种认识并非刘勰的独创，而是受到秦汉以来宇宙生成论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由此说明，他在《原道》篇中明显不是论证人的价值问题（此问题《序志》篇中已经涉及了），而是通过阐述人性的自然特质，将天、人与文之间联系起来。所以，“自然之道”才是刘勰的论述重点，以此引出了他关于自然人性和文章的本质规定之间的内在关联。于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便集中体现了刘勰对人文发展演变的思考成果，重点指明了文章的自然特性源自人的自然天性。也就是说，在刘勰心中，文的自然特性的展现是基于人的自然本性，如果没有自然之心，也就不会产生自然之文。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L.A珀文曾给“人格”一词下过定义：“人格是认知、情感与行为的复杂组织，它赋予个人生活的倾向和模式（一致性）。像身体一样，人格包含结构和过程，并且反映着天性（基因）和教养（经验）。”[①]在人格科学的理论视野中，人格是不断发展的，它与个体的天性与教养息息相关，二者交互作用下生成了人格的基本面貌。而对于究竟何者对人格起决定作用，人格科学也未能给出标准答案。所以我们只能说，先天天性与后天教养对人格发展而言同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刘勰恰恰也是从这两个方面来审视和认识人格的重要性的。

（一）对自然人格倍加珍视

有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的人格取代了儒学的人格”，“自然的美学代替了雕饰的美学”，“自然英旨”成为该时期的重要审美范畴。[②] 应该说，这一评价是有其合理性的。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刘勰所标举的自然人格并非是逍遥任性、不受礼教束缚的，他更多的是对人的自然天性（真情）的一种呵护和珍视。并且，刘勰是从“文”的角度提倡自然人格的。

《情采》曰：“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刘勰认为，写作的根本原则是对情的根本坚守，如此文辞才能畅达，从而突出了自然情感对于文章创作者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出于这样的认识，刘勰对作者的至性真情高度赞扬，非常注重呵护作家的自然天性，认为好的文章出自于自然率真的情感。无论是贾谊的“俊发”、司马相如的“傲诞”，还是扬雄的“沈寂”、班固的“雅懿”，他都赞赏不已。但是“俗皆爱奇，莫顾实理”（《史传》），对于初入文坛者而言，往往容易丧失其本真的天性。对此，刘勰给出的建议是“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序志》），顺从自己内心的本性而为，才是表达文心的最佳方式。故而他对“为情而造文”者深为欣赏，而对“为文而造情”（《情采》）者有所不满。例如，刘勰十分欣赏“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才略》），皆因他们均是以自然人格进行文学创作的。可见，“自然”在《文心》之中具有双重意涵，既指一种诗学风格，也指一种人格理想。自然的人格理想作为刘勰诗学观念的坚实底蕴，深深影响着他的诗学主张。

（二）对文人个性充分肯定

刘勰认为文章应以“述志为本”[③]（《情采》），所以他对文人的创作个性保持了极大的尊重与肯定。由于承认“性各异禀”（《才略》）的合理性，刘勰充分肯定作家后天积累经验的过程，十分欣赏“各师成心，其异如

---

①[美]珀文著：《人格科学》，周榕等译，第415页。

②参见袁济喜：《自然的人格与自然的美学——魏晋南北朝美学札记》，《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6年第2期。

③刘凌：《古代文化视野中的文心雕龙》，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页：“这里的‘志’，毕竟不完全等同于以往的政治理想，而增强了作家性情和个性的时代内容。”

面”(《体性》)的文学风格。在他看来，作家通过后天的学习过程，不仅可以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而且能够塑造不同的才能，最终形成多样的文章风格。这种认识虽简单质朴，但却难能可贵，其中透露出的是刘勰对个性自由的张扬与肯定。正因如此，他对文人的现实遭遇也表达了一定的宽容和理解。刘勰认同“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程器》)的事实，故而“提倡一种作家批评的宽容理论”①。尽管他对历代文人有所批判，但依旧能够看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并从不同角度对其作品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究其原因，这既与刘勰的自身经历有关，也与他的自我认知相关。如前所述，刘勰在对人学价值的历史考察中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自我价值，明确知道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恰好他又处于人的主体精神与审美精神逐渐觉醒的魏晋南北朝时期，② 因而他从心底尊重个性自由，欣赏富有个性的文章之美。受此思想影响，刘勰强调后天修养对作家人格与文章风格的重要作用，希望文人可以通过自我努力做到“文武之术，左右惟宜”(《程器》)。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尊重与宽容的态度，代表了刘勰的思想认识从“贵我”走向了“贵人”，暗含着他对人学价值的深切认同。

李天道先生说：“中国诗学具有一种‘贵人’的美学精神。”③刘勰自然也受到了这种“贵人”美学精神的影响，我们从他对“自然的人格”充满敬意、对文人性格的差异和文章风格的多样表示充分的理解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与所谓“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思潮有一定的关联。恰如不少研究者所认为的，刘勰对当时的时代思潮是认同的，也是接受的。需要指出的是，他所标举的人学价值毕竟不同于同时代的玄学家与佛家。因为后者更多地体现为人生境界的扩充与延展，往往采取逍遥任世或冷眼旁观的态度，而刘勰所奉行的则是积极有为的人生理想，着重强调个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实现。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刘勰充分肯定人的个体人格与个体情感，但他又对文人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希望他们可以“纬军国”“任栋梁”(《程器》)。可见，刘勰所坚持的“贵人”精神，既富有鲜明的理想色彩，又具有浓烈的现实意味。这应该说是刘勰的局限所在，但并不影响他对人学价值的肯定。总而言之，无论是对自然人格的呵护与肯定、对文人个性的赞扬和理解，还是对文人事业的严格要求，刘勰都在高扬人学价值，这对提升文学价值而言意义非凡。

二、诗学价值的生成：从“陶铸性情”到“开学养正”

如前所述，由于深受“贵人”思想的影响，刘勰看重个体精神的长存，强调“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序志》)的重要性。应该说，刘勰在对人学价值的深刻体认中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诗学的重要价值。所以他在《序志》篇抒发完自我心声之后便强调道：“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这既是他对文章功能的理性认识，也是对文学价值的由衷赞扬。在刘勰看来，文章不仅可以为社会政治服务，而且具有重要的经典层面的意义。虽然他说“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程器》)，似乎表明对为文用于世充满了期待，内心十分渴望成为一个“文武之术，左右惟宜”(《程器》)之人。但他的认识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意识到了文章乃是经典的枝条，经典乃“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宗经》)。因而文章的功用就不仅仅是“达于政事”(《程器》)而已，而是具有成为经典流传后世的永恒价值。

那么，如何才能保证诗学价值的长存呢？具体而言，刘勰看待这个问题，主要是从对文学自然性情的坚定维护和对文章纯正品格的高度重视两方面着眼的。

(一)坚定维护文学的自然性情

众所周知，刘勰是在南朝文学朝着抒情化、形式化发展之时开始撰写《文心》的，“怎样对待这种文学发展趋势，就是《文心雕龙》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也就是产生《文心雕龙》的具体原因”④。对于处于当时文学思潮中的刘勰而言，他有责任和义务为文学的良好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我们从《文心》中可以明显看出，刘勰

①参见李建中：《文心雕龙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②参见郁沅：《主体精神与审美意识的觉醒——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潮之内核》，《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③李天道：《中国诗学之“贵人”美学精神》，《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2期。

④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引论”，第4页。

非常重视人的自然天性(真情)，十分欣赏“为情而造文者”(《情采》)；也非常重视创作者的个性，推崇具有创造性的文章。凡此种种，都可以看作是刘勰对时代所赋予他的命题做出的回答。他更多地考虑的是文学如何才能打动别人，以及文学怎样才能彰显个体的存在价值？

《情采》曰：“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刘勰将“为文者”与“为情者”进行了对比，指出“后之作者”的主要问题是远离真情，一味追逐文采，从而导致文坛之上虚浮之风弥漫，文人之作普遍缺乏真情实感。面对此种情状，刘勰认为应该“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摛藻”(《情采》)，应先积聚自然真挚、饱满充沛的情感，再进行具体的写作。这一要求贯穿于《文心》多处。比如《神思》篇“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强调饱满自然的情感积蕴对艺术构思的重要性；《体性》篇“夫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见”，强调真实自然的情感对艺术风格的塑造作用；《熔裁》篇“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亦昭示了情理于辞采施展的基础作用……

由此可见，无论是文章创作的一般规律，还是具体的写作方法，刘勰始终强调情感的重要地位，尤其重视个体情感的自然抒发。而他之所以时时刻刻在维护文学的情感特质的前提下展开具体的论述，其根本目的是要从情感本体论的角度为文学价值做出普遍设定。① 在这种价值设定的背后，隐含的是刘勰对文学价值的理解，而这一理解的形成主要缘于其对人学价值的认知。人学价值的中心内涵包括主体顺从内心、发扬个性，以此实现个体存在的价值。这种思想落实到文章创作中，则集中表现为“重感情、重才性、重自我”②。所以刘勰深刻地认同“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认为情感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奠定了文学的生命本体。有此生命本体，文学才具有永恒价值。以此认识出发，刘勰强调“万趣会文，不离情辞”(《熔裁》)。应该说，“情感本体”在刘勰这里得到了坚决贯彻，从而建立了《文心》“以情为本，文辞尽情”的理论体系。③

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刘勰对圣人文章非常崇拜，特别赞赏上哲“陶铸性情”(《征圣》)的不朽功绩，也极为推崇经典“性灵镕匠”(《宗经》)的重要作用。为此，他提出了征圣、宗经的主张，强调写作应以经典作为模范，以求达到“六义”的理想标准。这似乎与其维护文学的自然性情的主张有所抵牾，却是他文学思想的实际倾向。恰如罗宗强先生所言：“刘勰站在其时文学思想的发展潮流之中，而比同时的其他思想家更冷静地思考问题。对于其时文学思潮发展的许多实质问题，他是接受的，认可的，但是他要把这个思潮引向雅正。”④在刘勰心中，自然深挚的情感固然重要，但感情的自然抒发绝不能偏离经典的雅正，否则“若任情失正，则文其殆哉”(《史传》)。在刘勰看来，“情感本体”需要以普遍的美善要求为基本原则，只有如此文学才能兼具现实价值和审美价值，其意涵也才完整。所以刘勰主张通过“陶铸性情”的方式引导文学创作的正确走向，从而达到“极正归本”(《宗经》)的目的。究其实质，刘勰并非要简单地回归儒家的诗教传统，而是要在与时代浪潮中进行诗学观念的更新与深化，从而适应当时文学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

(二)高度重视文章的纯正品格

综观《文心》，应该说刘勰对文章持有十分尊重且谨慎的态度。在《原道》开篇，他就明确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从而奠定了《文心》“论文”的根本精神。《序志》篇末，他又满怀深情地写下了“文果载心，余心有寄”的句子，寄寓文章传达个人理想抱负的殷殷厚望。由此可见，从始至终，文章在刘勰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他力图使文在展现个人思想、实现个人价值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而非常看重其现实品格。

例如，《指瑕》曰：“制同他文，理宜删革。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刘勰意在说明，文章应该注重原创，如此才能忠实内心，真正展现自我价值。而文学价值的实现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前提是保证文章品格的纯正。故其曰：“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若能隐括于一朝，可以无惭于千载也。”(《指瑕》)这主要是因为文章的品格往往与作家的人格相关，虽然二者难划等号，但毕竟关

---

①参见李咏吟：《情感本体与刘勰关于文学价值的普遍设定》，《文史哲》2014年第2期。

②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版，第209页：“他(刘勰——引者)是看到任自然的文学思想发展潮流了，他是那样地重感情、重才性、重自我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

③参见戚良德：《文论巨典——〈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5-91页。

④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287页。

系重大。在刘勰看来，“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①]，是值得为之付出一生心血的人生事业，它如同人格一般，能够“万古魂动”(《史传》)，名垂千古而不朽。所以他一再强调“斯言一玷，千载弗化”(《指瑕》)，“一朝综文，千年凝锦”(《才略》)。这既可以看作是刘勰对文学纯洁性的严正维护，也可以视为他对诗学价值的有力肯定。

正因有此认识，刘勰始终着眼于文章的未来发展，试图通过确立一种人格范式来加以引导。在他看来，前贤之所以伟大，主要缘于他们“学坚才饱”(《杂文》)。因而刘勰主张“文章由学”(《事类》)，多次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如《神思》篇中将“积学以储宝”作为写作的首要步骤;《体性》篇中认为文章风格的形成，应当“功以学成”。乃至学童的文学教育问题，他也明确倡导“才童学文，宜正体制”(《附会》)。在刘勰的心目中，最佳的学习范本莫过于儒家经典，因为其“义既挺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宗经》)。这主要归功于儒家经典具有开示后学、涵养正道的巨大作用，所以刘勰鼓励后学之人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来实现自我价值。然而他并非一味要求以儒家经典为本，进行亦步亦趋的学习，而是采取更加包容的心态。例如，《辨骚》篇高度肯定了屈原的艺术成就和人格精神，对屈辞的感人力量与独特风格给予了充分赞扬。可见，在刘勰心中，好的文章虽有一定的标准，但不可缺少的是坚贞纯正的思想内核，如此才能成为经典永远流传。他之所以要倡导“征圣”“宗经”，目的是要“开学养正”，以此来开拓文学事业千古传承的路径。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认识到，刘勰的诗学追求作为其人格理想的具体化和学理化，具有鲜明的人学色彩。在对自我价值充分肯定的前提下，刘勰积极追求文学价值的实现，试图从人文层面开拓文章巨大的文化意义空间。从“陶铸性情”到“开学养正”，《文心》完整地诠释了人格义的全部内容;前者代表对先天天性(基因)的规定，后者意味对后天教养(经验)的塑造。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既保证了文学价值的延续，也使人学价值得以贯彻和延续，最终促成人文精神的坚守和传承。

三、作为“中国文论元典”的《文心雕龙》

牟世金先生曾说：“《文心雕龙》是既总结前人创作经验，更针对当时创作倾向，也汇总了历代文学理论成就的一部重要著作。”[②]这的确是《文心》的重要特征，但在笔者看来，支撑这部“体大思精”之作的，不只是丰富的文学理论问题，还有其内在坚实的人文精神，它深刻地影响着刘勰对“文论”之作的独特认知。恰如戚良德先生所言：

> 中国的“文论”不仅是“文艺学”或者“文学概论”，而是关乎所有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领域的人生通识，是通向人生自由境界的文化能力。因此，刘勰的《文心雕龙》，既是一部中国文章写作之实用宝典，又是一部中国人文精神培育的教科书;既是中国文艺学和美学之枢纽，也是中国文章宝库开启之锁钥。[③]

这是从《文心》所论之“文”的实际情况出发，还原了这部“文化元典”[④]的真实面目，并给予了它更为全面、客观的评价。这一评价也让我们认识到，《文心》之中蕴藏的不仅是中国的文章学、文艺学、美学等理论知识，还有丰富的人文精神资源。它是这部“文论元典”的生命和灵魂所在，彰显出刘勰对文章人文价值的独特领悟，并深深影响着经典的创构与生成。

袁济喜先生亦谓：“《文心雕龙》的价值，在于她的经典性，而人文精神则是其中最深层的精神蕴含。”[⑤]

---

①魏宏灿:《曹丕集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

②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引论”，第5页。

③戚良德:《文章千古事——儒学视野中的〈文心雕龙〉》，《文史哲》2014年第2期。

④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页：“只有那些具有本根性和原创性意蕴，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方可称之‘元典’。”以此而论，《文心雕龙》亦属于文化元典之列。

⑤袁济喜:《论〈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与当代意义》，列举了对《文心》人文精神塑造起主要作用的三大要素，分别是：“对于古代儒家人文精神的传承”“对于佛学精神的张大”“自身人格精神的融入”。见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文心雕龙研究》(第八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22页。

所谓“人文精神”，一方面强调“人”的存在意义，重视人学价值的延续；另一方面突出“文”的成人之功，注重文学价值的作用。这便是刘勰所考虑的人文事业，既关乎价值（人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实现，又关乎生命生成。于刘勰而言，他论文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亦是为了使“文心”可以延续千古。因而《文心》的关注点始终未曾脱离“人文”。具体而言，一是对“文的理想模式”的寻绎与建构，二是对理想人格的追寻与塑造。

（一）“文的理想模式”的寻绎与建构

李泽厚、刘纲纪二位先生说：“刘勰的《文心雕龙》不是‘铨序一文’，而是以‘弥纶群言’为己任（《序志》），它的目的是要对自古以来的，特别是魏以来文论作一个综合的总结，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①李建中先生也有类似的说法：“文学创作的彬彬之盛，文学风格的其异如面，既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料及例证，同时也给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要求：不再是品评某一位作家或某一种文体，而是要铨衡群彦，品藻诸家。”②这些说法均表明，现实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文学理论问题要求刘勰从理论家的角度进行理论性的说明，以便更好地指导当时和未来的创作。从《文心》全书来看，刘勰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建构起了一个“体大而虑周”的理论体系。罗宗强先生认为，刘勰的理论体系有一个明确的“理论核心”，并指出“这个理论的核心实质上是一个文的理想模式。他规范出这个理想模式，以它为中心，向各个方面展开他的理论”。③ 高宏洲也认为《文心》“文之枢纽”的主题是寻求“理想之文”，力图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一种理想标准。④ 尽管这种描述和认识并不一定符合刘勰的原意，但至少为我们揭示出了《文心》的文化内蕴，即刘勰将追寻“理想之文”、发展人文事业作为完满其人生的重要内容。

实际上，并非只有刘勰一个人专注于建构“文的理想模式”。在所谓“文的自觉”时代，“中国古代诗学文论作为一门学问或学科”——“诗文评”正式诞生了。文体齐备、文论之作大量涌现，广大批评家的思想也表现出了一致性的特征。首先，这一时期的文论家们不仅普遍关注文体分类、作家才性等具体问题，而且对“文”的价值、功用及其特性问题均有所注意。其次，这一时期的批评家们普遍确认了自我身份，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职业责任。⑤ 最后，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企图尝试对所接触到的各种问题展开思考，并作系统而深入的阐释。尽管他们各自立论的角度不尽相同，但最终都将矛头指向了“文”本身，均试图为“文”的当下和未来发展寻觅一条合适的轨道。当自发的理论阐释行为上升到思想认识层面，便体现为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具体表现为文艺理论家们深切地关注文的建设与发展问题，企图共同寻绎和建构出一个“文的理想模式”。究其实质，“寻绎”是一种文学意识上的“自觉”，是作为历史主体的文论家们为了更好地认清文学发展的现状而进行的体验、把握和再认识的探索过程；“建构”则是历史主体在种种的主客观历史条件作用下的生动实践，具体指由不同的文论家通过生成各具面目的理论话语、创设纷繁各异的理论体系等方式，从而能够更好地指导“文”的发展的有效实践（也包括精神实践）方式。

故而有学者认为，刘勰的《文心》与钟嵘的《诗品》作为该时期文论中的佼佼者，建立了中国文论史上最早的两种“批评史范式”，对后代文论产生了长远影响。⑥ 在笔者看来，刘勰所创立的“范式”，并非只是“究源流、评工拙”而已，而是更具包容性的。他并非只想探究文学源流发展、衡量文章工拙、评论作家作品优劣，而是要建立起“文的理想模式”，从而达到重建人文精神的目的。就此而言，刘勰的回答，不仅是认识论层面的，也是价值论层面的。总之，它是刘勰“文心”之所在，处处充满着人文精神。或许这样的评价未

---

①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82页。

②李建中主编、高文强副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0页。

③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230页。

④参见高宏洲：《“理想之文”的寻求——〈文心雕龙〉“文之枢纽”新解》，《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⑤参见胡大雷：《论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家对自我身份的确认》，王杰主编：《东方丛刊》1998年第3辑（总第二十五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6-328页。

⑥李建中先生认为，《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的“‘诗文评’类小序”，“或可视为最早的也是最简的‘批评史’”，它指明了“批评史上颇具代表性的五种范例或范式：究源流、评工拙的刘勰式，第甲乙、溯师承的钟嵘式，备陈法律的皎然式，旁采故实的孟棨式，还有体兼说部的诗话式”。（参见李建中：《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本与根》，《光明日报》2020年3月30日第13版）

必符合刘勰的思想，但他所做的工作的确奠定了《文心》作为“中国文论元典”的思想基础。当我们以今人的眼光重新审视这部经典时，它的人文色彩显得分外耀眼。

（二）理想人格的追寻和塑造

文学是人学，是心灵的产物，文学价值的实现需要通过人来完成。对此，刘勰从人文生成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体认。他在《原道》篇对“文”的产生进行了理论考察后，特别强调了人的作用。其曰：“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刘勰认为，正是因为有人的参与，人类才有语言，而后才有文章。宇文所安据此认为：“按照《文心雕龙》独特的自然哲学，在自然过程中存在某种使固有的区别得以显现的动力，这就暗示着‘心’的必然出现；如果没有识别和知晓该显现的主体，呈现就无法完成。”[①]因而《原道》篇中的这句话，既可以看作是刘勰对人文产生问题的逻辑演绎，也可以视为他对主体精神逐渐觉醒的高度赞扬。可见，在刘勰的思想认识深处已经有了自觉的主体精神，他对理想的“文心”充满期待。然而，“刘勰对‘文心’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初识到体悟，再到建设的完整过程”[②]。最终，在充分体认“文心”的基础上，刘勰走上了积极建构“理想之文”的道路，他也开始了追寻理想人格。所谓“理想人格”，指一个人主观精神追求所期望的理想目标。具体到刘勰，他所追寻的理想人格主要是指一类能将建设“理想之文”的美好愿望落到实处的实践主体。他既不是如孔子一样的圣人，也不是像沈约那般的文士，而是能够领悟和传承“为文之用心”的人文实践者。

从本质上来讲，刘勰关注“文”的未来发展问题，所追求的其实是一种“潜在的现实性”。从《文心》来看，刘勰并没有将自己定位为一位文人，而是多以文论家的身份和立场考虑问题，力图为文学发展指明方向。例如，当他看到“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定势》）、“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定势》）的文坛乱象，并没有一味批判，而是客观地指出问题所在，认为主要是因为“去圣久远，文体解散”（《序志》）的缘故。紧接着在进一步的比较中，提出了规范引导的想法。再如当他看到历代文士身上的诸种瑕累，也没有一味苛责，而是提倡宽容的对待，并给出了“君子藏器，待时而动”（《程器》）的建议。应该说，刘勰并非想以一种教化者的身份要求文人，他更多地想以一种启发者的姿态引导文人。因而无论是对“爱奇”之士的批判、还是“涓流”之士的宽容，他均专注于其人格意志的培养，以及人文精神的涵化，这无不与刘勰的论文旨归息息相关。

通读《文心》，我们能深切地体会到著者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刘勰创构《文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安顿“文心”，即其所谓“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序志》）。这句话可谓意味深长，它既道出了刘勰的由衷心声，也映照出其高洁人格。研究者一般认为，这句话主要强调的是“余心”。这种理解固然是不错的，但恰恰忽视了刘勰的最大理想是要有所“寄”，希望有所表达。因而他将“文”视为传递心声的媒介，期望通过论文的方式寄托自己的理想。论文的过程，既是寄托心灵的过程，也是彰显人格的过程。诚如李建中先生所言：“对于刘勰这样一个文艺理论家，‘为文之用心’就是他的魂，他要通过写一部文学理论之书来安顿自己的灵魂，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来把他的文化之根和现实连接起来。”[③]所以，刘勰考虑的不单单是文学问题，而是将论文作为一项自觉的生命实践，将扩充个体人格融入到了《文心》的写作过程中。

珀文说：“人格包含过去的影响及对现在和未来的建构，过去的影响中包含对过去的记忆。”[④]也就是说，人格不仅受过去的知识积累左右，也受未来的期望目标影响，“我们对未来的梦想是我们人格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序志》篇中刘勰的两个梦看得清清楚楚。于刘勰而言，他不仅对自我人格有充分的认知，而且具有明确的完满自我人格的想法。在追求自我实现的道路上，他的人格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既有圣人人格的感召，也有时代自觉精神的塑造。在此过程中，刘勰的人格不断得到扩充和完善，最终落实为对人文精神的追寻。刘勰力图找回逐渐遗失的人文精神，延续文学给予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为

---

①[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93页。

②参见杨来来：《刘勰的“文心”论及其理想人格思想》，《中国文论》（第六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1-105页。

③李建中：《文心雕龙讲演录》，第189页。

④[美]珀文：《人格科学》，周榕等译，第415页。

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可以说，无论是对当时的文学论争问题，还是对未来的文风走向问题，他都努力从人文精神重建的角度加以考量和回应。这体现了“元典的超越性”特质，不只立足于当前的现实问题，亦着眼于未来的可能性问题，始终关注“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普遍性问题”。[①]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将《文心》称之为“中国文论元典”应当是合适的，这正是其作为经典的意义所在。

结　语

李春青先生指出，“探讨中国古代文化主体的心理状态、人学观念、人格理想是如何显现为诗学观念的”，这是“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诗学观念生成的主体心理依据以及价值论基础”。[②] 本文所做的工作正是此种意义上的。通过上文探究，我们认识到，刘勰的人格理想与诗学追求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即从人学价值到诗学价值的认识论转向。正因为有此认识上的转向，刘勰创构了一部富有理论生命力的思想经典。他对人文精神的坚守和追寻，不仅为我们展示了著者的千古文心，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恰如戚良德先生所言：“刘勰及其《文心雕龙》，毫无疑问也奉献了一部新的思想文化经典。这部经典述往知来、开学养正，为当时以及后来之人提供了一个人生文化修养的指南，也提供了一个可以具体操练的思路和程式。”[③]这主要缘于刘勰之“文心”，既关注人学价值，也关心文学价值，更关乎人文传承。此三者贯穿于整部《文心》之中，成为刘勰论文的根本立足点。明乎此，我们才能对《文心》作为“中国文论元典”的性质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From Humanistic Value to Poetic Value

——on the Inner Connection between Liu Xie's Personality Ideal and Poetic Pursuit

YANG Lai-lai

(School of Litera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entire book *Wen Xin Diao Long*, Liu Xie consistently emphasized the value of humanism and poetics, and placed his personal ideals in the pursuit of literature, creating an inherent connection between his personal ideals and poetic pursuits. Follow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iu Xie's personality realm and poetic realm will help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of the purpose and textual nature of the paper. On the premise of fully affirming his self-worth, he actively pursued the realization of poetic values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enormous cultural significance space of his articles from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Therefore, *Wen Xin Diao Long* always focu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deal mode of litera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deal personality, with the aim of rebuilding humanistic spirit, which reflects its transcendental characteristics as a "Meta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Key Words: *Wen Xin Diao Long*; humanistic value; poetic value; meta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责任编辑　唐音]

①参见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第332-334页。

②参见李春青：《在人格与诗境相通处——论中国古代诗学的文化心理基础》，《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李先生围绕此论题做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如：《在“立言”与“立功”之间——刘基的人格理想、学术旨趣与文学思想之关联》，《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从人学价值到诗学价值——论苏辙“养气说”的深层含蕴》，《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3期，等等。

③戚良德：《文章千古事——儒学视野中的〈文心雕龙〉》，《文史哲》2014年第2期。